

---

# 城乡文明融合互鉴： 构建中国乡村文化治理新发展格局

胡惠林<sup>1</sup>

**【摘要】：**城市和乡村是两种文明形态和社会文化体系。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同时提出了两个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历史性需求。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提出了重建乡村文化治理的文明体系和新发展格局的文明性命题。城乡一体化是中国传统乡村文明与治理体系的历史性特征。全球化进程在改变了中国城乡一体化格局之后，也为传统中国乡村社会提出了新文明发展的新要求。现代城市文明是现代全球文明生产力的主体。借鉴城市文明发展成果积极推动乡村文明建设，同时在城市文明更新过程中给予乡村文明以积极支持，并在融合与发展中改造与重塑乡村文化治理的微循环体系，建设新发展格局下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双循环文明体系。

**【关键词】：**城乡文明互鉴 乡村振兴 乡村文化治理 新发展格局

**【中图分类号】：**C91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7-9092(2021)05-0086-008

城市更新和乡村振兴是“十四五”时期我国发展与改革的两大战略任务。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总体政策目标中，都同时面临着转变治理观念、创新治理模式、提高治理能力、创建治理体系等问题的重大挑战。如何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下，构建城市和乡村治理的新发展格局，对于推动城乡发展双循环新格局和新治理体系建设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

尤其是在我国从根本上完成了脱贫攻坚任务之后，如何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进乡村建设过程中推进乡村治理变革；在城乡一体化的战略规划中建设乡村文化治理体系，以确保乡村振兴战略目标的实现，已经成为整个“十四五”时期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重大命题，影响和决定了整个新发展格局的构建和百年国家建设与发展目标的实现。

## 一、中国城乡文明关系再认识：推进乡村文化治理创新与变革的基本前提

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是在城市化进程中提出来的中国农村、农业和农民革命问题。城乡互为建构与相互塑造是这场“新三农革命”发生的重要原因，也是构成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性关系变革的重要机制性特征。

1. 城市和乡村(农村)是两种不同的文明形态、两种不同的社会组织形态和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城市是以市民为主体，乡村(农村)是以农民为主体。中国的城市是在乡村的孕育中发展起来的，不同于西方城市是在城邦的基础上孕育发展起来的。

在长达五千年的农耕文明发展史的历程中，城乡一体化始终是中国城市和乡村的文明关系，它们同处于一种农耕文明关系之中。城市只是乡村的另一种空间形态而已，并不是不同于乡村文明的另一种文明形态。城市的生成与发展都是为乡村服务的。城市是乡村商品经济的市场形态和交易场所，是乡村治理的行政治所和安全防卫中心，但它依然是属于整个农耕文明体系的。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城市，是在 1840 年鸦片战争之后，西方用工业文明的大炮轰开了中国农耕文明的大门之后才逐渐出现和

---

**作者简介：**胡惠林，上海交通大学二级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文化产业创新与发展研究基地主任。

---

形成的，是在强加给以农耕文明为基础的中国传统城市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农耕文明依然是中国城市文明内在构成的底色，不仅北京、开封、西安、南京等城市如此，即便如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等五口通商城市，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中国城市文明和乡村文明基本属性和特质的同一性：农耕文明。

2. 这一基本特质和属性，不仅决定了中国城乡之间的二元关系内在的文明逻辑，而且也正是这一属性决定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是无产阶级领导下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土地革命。中国社会的农耕文明性，以及以农民为主体的农业大国的基本国情，决定了中国革命道路只能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sup>1</sup>，而不是如苏俄革命那样通过工人武装起义和城市暴动、城市革命来实现。虽然，中国共产党的早期领导人也试图走城市暴动和城市革命的俄式道路，但屡试屡败。最终在毛泽东创建和建立的农村根据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下，才取得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

新民主主义革命是如此，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也是如此。这就决定了中国走的是一条与苏联不同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是建立在帝国主义最薄弱的环节的欧洲工业文明基础上的，而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是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农耕文明基础上发生的。这是与俄国革命在文明基本点上的最根本的区别。

虽然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道路给了中国革命以深刻的历史性影响，改变了中国社会发展的文明道路与文明方向，但是，中国共产党人还是以自己的革命实践找到了一条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与建设的发展道路。中国特色的最大特色就是一切从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出发、实际需求出发，坚守中华文化立场，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并且在这个过程中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华文明的当代形态，一种人类文明的新形态。

3. 中国城市发展史具有与乡村发展史的同一性。在中华文明五千年的发展历史中，城市是农耕文明时期社会生产力和社会发展形态最重要的呈现方式之一。随着社会分工的发展，逐渐地从乡村文明体系和文明结构中分化出来、延伸出来，而后取得独立的空间构造体系和空间表达形态的社会生活方式和价值存在，与乡村共同构成了中国农耕文明发展的动力系统。

城市是乡村的另一种表现形态。它是乡村治理的行政中心所在地、商贸流通的交易集散中心和地方安全的防卫保障。平时农民进城赶集，战时农民进城躲避战乱。城市是乡村的另一种生存机制和生活场景，一种乡村文明的空间构造与表达系统。

中国城市是由乡村建构起来的，同时城市的发展又给予乡村建设与发展反作用。乡村社会、乡村经济、乡村政治，乃至乡风和民风、习俗的演变发展，都与乡村与城市间的距离存在着引力关系。离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越近，其接受大城市各个方面的影响也越大，其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也越高。

离开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越远，乡村接受城市影响与辐射越小，其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程度越弱。乡村发展和治理与城市的规模引力成正相关关系，与城乡间的距离成负相关关系。这不仅与城市规模和城乡距离存在着空间引力关系，而且还与城市的现代性属性存在着时间引力关系。中国古代社会城市构造体系中的所谓“京畿”地区就是最典型的存在。

4. 上海是一个完全在国际贸易经济和外来商业文化基础上开埠发展起来的现代工商业城市。高度的国际化是它最典型的标志。相较于其他在农耕文明基础上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大城市，现代工业文明构成了它最显著的城市现代性特征。正是这一特征建构了它对周边乡村乃至城市巨大的辐射性与引力作用。

不仅一般的农村经济的变动发展受到它的巨大的引力波的作用，而且还深刻影响了上海周边城市的变迁。苏州原本是一个江南地区的中心城市，无论规模还是各个方面的能力都比上海要大得多、强得多，随着在工业文明引领下的上海的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崛起与发展，形成和诞生于农耕文明时期的江南大都市——苏州不得不随着文化建设和经济中心向上海转移，把江南文化中心和大都市的地位让给上海。而其对周边乡村社会经济政治文化变迁的影响则更为巨大。

---

茅盾的短篇小说《春蚕》《林家铺子》和长篇小说《子夜》，极为深刻形象、全景式地再现了上海这座新兴的工业化城市对长期处在农耕文明、小农经济体系中的各种社会能力造成的毁灭性的冲击。正是由于这样一种引力关系，改革开放之初苏锡常地区的乡村建设，依托于上海的“星期日工程师”创造了一种“苏南模式”的“乡办企业”之路，与“温州模式”同为改革开放的并蒂莲。也许正是因为这种城市化影响，使得苏南地区的乡村贫困率是全国最低的，而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则是比较高的。在这里，城乡融合的现代化程度也与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性程度成正相关关系。

## 二、城市化进程中的乡村文化治理革命

中国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是一个与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与城市治理、城市更新相呼应的革命性历史进程。中国的新城市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市民革命在给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带来深刻影响的同时，中国的乡村振兴、乡村治理、乡村文化建设和乡村治理文化的重建，也将给中国的新城市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市民革命带来深刻影响。

1. 近代以来，中国的乡村文化和文化治理演化与发展，始终受到中国城市化进程的深刻影响。这种影响不只是发生在上海、杭州等沿海大城市，像四川这样的内陆省份也受到深刻影响。巴金的小说《家》《春》《秋》是曲折反映这种深刻变化的代表作。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除了内生动力强弱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制，那就是它能够把城市治理能力转化为推进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建设的文明动力。

文化治理能力贫困是现代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不足的显著特征。造成这一不足有许多的原因和条件，其中起决定性作用的，就在于它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把城市的现代文明成果转化为推动和提高乡村文化治理能力的优势。云南腾冲和顺乡地处西南边陲，可谓穷乡僻壤，然而这里虽然远离大城市，却建有从幼儿园到高级中学完整的现代教育体系，拥有闻名全国的以艾思奇故居和顺图图书馆为代表的边地乡村文化。

这就是因其通过缅甸密支那开辟了与上海的贸易交往海上航路，使得和顺乡得以借助于从上海带来的现代城市文明成果，创办和顺图书馆而领风气之先——孕育了像艾思奇这样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这深刻表现了城市文化对乡村文化进程的现代化影响。

2. 这一进程在新中国成立后得到了全新的发展与变革。城市对乡村建设与乡村文化建设、乡村文化能力建设的作用与影响，通过大规模的农业生产力的社会主义改造与农业现代化进程的推进而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性改变。以农村文化馆和农村中小学教育体系为核心的乡村文化建设得到了历史性的空前发展，广大农民受教育程度普遍提高，农村文盲率降低到历史性水平。

1978 年改革开放之后，把这一历史进程推进到了一个新时期。尤其是进入 21 世纪之后，以互联网和高速铁路网为代表的现代基础设施的建设与完善，从根本上改变了城市与乡村之间的存在性关系；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农民以及乡村生产力与城市乃至整个外部世界的现代关系。这给中国传统社会与乡村建设带来了革命性的影响，给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带来了历史机遇。传统的中国农业社会正是在这样一个进程中发生了静悄悄而又轰轰烈烈的结构性治理巨变。

3. 这种巨变是由新农民—农民工的出现和生成带来的，由此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新农民革命。农民工进城打工，在支持城市建设和弥补城市生产力不足、充实城市更新建设生产力的同时，也把自己推到了新农民革命和新农业革命的历史进程中。农民工通过自己辛勤劳动把财富带回乡村的同时，也把城市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和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带回到了乡村。这成为重新塑造农村，推进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全新的“新三农革命”的重要参与性力量，从而使得以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为核心内容的新三农革命带有深刻的新城市革命、新工业革命和新市民革命的鲜明特征。

## 三、以城乡文明互鉴推动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以往的中国乡村建设与治理运动是从农村和农业革命出发的。而乡村振兴、乡村建设与乡村治理运动则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村现代化建设遭遇到一系列新矛盾、新问题、新需求后的一种必然选择与趋势，特别是与城市化进程相伴随的新农村建设和城镇化运动，是在城乡两种文明互相影响与建构中开展的。城市文明成果的借鉴，直接影响和建构了乡村文化治理体系的现代文明程度。

1. 城市和乡村是人类创造与建构的两种不一样的文化空间形态，相互之间有着明确的社会生产力条件下的文化分工，是人类社会建构的两种文化模式、两种文化生产形态与文明建构力量和机制。在中国，农耕文明基础上生成的城市是乡村文明的延伸形态，是农耕文明形成的一种关于乡村文明的治理体系和治理机制。它们之间的文化和文明关系是同一性的、互补性的。

而在西方工业文明基础上生成的城市文明，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对乡村文明剥夺的基础上建构起来的。资本随着工业文明渗透到城市文明机体中，使本来的人类文明进化、自然的逻辑分工，演化出城市与乡村两种价值观之间的文明冲突，背离了城乡文明的一致性。工业文明的出现极大地推动了人类文明建设与发展的同时，也引发了城市文明与乡村文明间的尖锐冲突。

2. 城市文化是从乡村文化走出来的，同时又超越了乡村文化，成为改造乡村文化的一种巨大的文明力量。乡村文化走向城市文化表现为一定历史和环境条件下，人类文明与文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城市是庞大的社会生产力机器，是一个比乡村要庞大得多、复杂得多的社会文明系统，无论在社会生产力的文明体系构成上，还是在社会关系的文明体系构成上，它都要比乡村有着更为复杂的结构。因此，也就需要有比乡村更为复杂的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结构。

工业文明生产组织的精细化、科学化和规范化，生成和造就了城市治理组织的严密化和社会的契约化。有效的城市治理，是有效的工业文明生产组织的重要社会保障。与现代城市的大工业生产相比较，长期在农耕社会中形成的小农经济，以及在这个基础上形成和建构起来的乡村社会治理观念和治理体系的松散性，是造成乡村社会生产力低下的重要制约性文明因素。

3. 中国传统文化是乡土文化，没有城市文化。这是历史的中国塑造的中华文明遗产。现代中国的城市文化是由工业文明进入中国之后才开始形成的。农耕社会的中国城市文化也是乡土文化，是乡村社会构造和乡土文化构造的集中化呈现方式，是乡村文化的空间形态与空间载体的典型标志。

中国农耕社会的城市同时又是一个政治和军事中心，是乡村治理的一种国家形式。它是实现有效乡村治理的重要体制和能力。虽然乡村治理一直是以自治形态出现的，但是一旦这种自治出现不可调和的矛盾与冲突，作为对这种矛盾与冲突的裁决就依然还是国家治理范畴和职权范围内的。“县城”“县衙”与“县治”之间存在着权力同构关系。县城的功能与职能是由“县衙”定义的，而“县治”又是由“县衙”这个权力机构来实现的。

由于执掌县衙的县太爷都是经由科举考试而入仕的，因此，它的关于“县治”的所有治理理念都是建立在乡村社会之上的，是以乡村文化精神为基础，从而在空间形态上实现了城乡文化治理的有机性、融合性，而不是如现代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是割裂的。因此，在推进中国国家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文化治理在国家文化治理总成本构成中是最大的部分。

这就决定了国家文化治理能力优势建设的重点是提高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培育和建设乡村文化治理能力优势。这就是习近平所指出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最艰巨最繁重的任务依然在农村，最广泛最深厚的基础依然在农村。”<sup>②</sup>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和治理水平的提高可以直接降低国家文化治理成本，进一步提升国家文化治理能力，形成文化治理能力优势。

4. 因此，乡村文化治理既要积极借鉴、消化吸收城市文化治理的经验和理念，又要保持乡村文化治理自身的特质与属性，而不是把城市文化治理的模式照抄照搬到乡村治理中来，把自己的能力建设消融到对城市文化治理能力建构的机械模仿中去。乡村文化治理应当与城市文化治理相区别，尤其是在乡村建筑形制、村落形态与格局建构上，要增加城市与乡村文化治理之间

---

的互补性，形成乡村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构的新格局。

## 四、城乡融合：建构中国乡村文化治理新发展格局

城乡融合应该是一个城市与乡村相向而行彼此吸引与建构的自然历史过程。在中国，这是一个重建城乡一体化的文明再汇流过程。

1. 城乡二元结构是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自然演化形成的，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性选择的结果，不是人为建构的。虽然在新中国成立之后有改革开放的需要，国家依据战略需求与国家安全需求建设一大批不同功能和性质的城市，建有城市飞地，但是，在某种程度上说，它们依然是中国社会发展历史性选择的结果，而不是人为的建构。广大的农村依然承载着维护国家安全和民族安全的不可替代的文明重任：“农为邦本”。

这种城乡二元结构不仅是社会分工形成的一种社会形态，而且也是在长期的历史基础上形成的城乡二元心理的一种结构性需求。彼此之间建立起的城乡文明关系是一种互补型关系，具有相对恒定的稳态系统。城乡融合不是要消除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城乡二元这一稳态安全结构，而是要更加合理地优化城乡二元结构，使之更加有利于中国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与繁荣安全。否则，乡村振兴就没有必要，也没有意义了。

那种关于城乡融合，把乡村融合为城市，试图通过“去乡村化”的新型城镇化来消除中国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的观点和理论，则是一种现代乌托邦的完全脱离中国社会基本国情的臆想。这种理论观点不仅不能消除中国传统社会的城乡二元结构，而且还会制造一种新的破坏性更大的城乡二元结构。一些拉美国家在进入中等国家发展行列之后，之所以掉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困境，其中一个重大原因就在于它的快速城市化进程制造的国家安全结构的解构。结果，不仅没有实现预期的进入发达国家的行列，反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国家安全困境，至今未能从中摆脱出来。

那种试图通过建设大城市群和超大城市群的城市发展带动乡村振兴的理论，则更是一种照抄照搬日本及其他一些西方国家经济发展模式的依葫芦画瓢的理论。殊不知“大树底下不长草”。中国应该探索一条适合于中国城乡文明关系基本国情的城市发展现代化道路和乡村发展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只有通过乡村振兴战略，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缩小乡村与城市之间的贫富差距来实现，而不是通过让城市兼并乡村来实现。

2. 城乡融合是一个城乡文明互鉴过程，是一种在城乡文明互鉴、发展意义上的融合。毫无疑问，在现代文明建设与发展方面城市具有领跑的优势，但是，乡村的“看得见山、望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的文明的社会生态美学场景，却是城市生态文明构造系统中所没有的，也是城里人对美好生活的一种现代性追求。现代城市文明与传统乡村文明都有一个现代文明转型的问题。

尤其是那些在消耗资源和污染环境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传统的大工业城市，传统工业文明的“锈带”正困扰着工业文明城市的发展。城市更新、城市再生，提出了城市文明的现代转型和现代城市治理的双重命题。这一双重命题恰好与乡村振兴、乡村更新和美丽乡村建设相重叠。

以共同发展提升社会文明程度的需求，以各自不同的生活和生存方式来呈现城乡融合，在城乡文明互鉴中推动城乡文化治理能力比较优势建设，在同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同时，又能够在传承、延续、发展、更新和再生城市和乡村文明和优秀传统文化的过程中，实现城乡文化治理的差别化发展。这种城乡融合既是有边界的，又是无边界的。

所谓有边界，那就是乡村依然是以农业生产为主体，城市依然是以工业生产为主体。城市的天际线和乡村的天际线同为两条美丽的文明天际线。城乡之间互通有无，城乡居民互相流动，相同的价值观和不同的生活方式形成了一种有机融合的社会整体。这是乡村振兴和乡村治理应当追求的一种理想境界。

---

3. 生活在现代都市里的人们对来自传统农耕文明手工产品的追捧，社会对优秀农耕文明文化的认同，国家通过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对诞生于农耕文明优秀文化成果的肯定，都是对农耕文明创造的人类文明价值的追认！因为，只有在这些优秀的文明成果体系中人类才能确认自身存在的全部价值和文明的合理性，其中就包括了传统乡村治理丰富的文明成果。

没有科学合理的乡村文化治理，就不可能有灿如星海的来自于农耕文明大地上的文明成果。而所有这些是现代城市文明更新与发展所需要的。这是一种文明滋养过程，也是一种文化治理能力塑造与更新、再生的滋养过程。这就是城乡文明互鉴、融合与城乡文化治理的美美与共。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昨天文明的成果。

今天中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昨天、五千年农耕文明创造和缔结的成果，是中华民族用双手和智慧凝结而成的。中国的文化自信和民族自尊心，就是建立在这样的文明成果基础之上的。中国的乡村就是它的创造和生产基地。离开了中国乡村就没有五千年中国文明；离开了中国乡村文明就没有今天的中华文明以及今天中国人的乡愁。

4. 中国的乡村是一个浩瀚无边的文明大海，取之不尽，用之不竭。这是城乡融合和城乡文明互鉴的雨露阳光和空气。当然，中国的乡村也曾是造就中国人一切封建思想和惰性——国民性的文明场所。曾经被“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先贤们痛批为“吃人”的社会，制造了一群在乡间生活的麻木漠然的中国人。

鲁迅的《祝福》《药》《阿 Q 正传》等一系列文学作品以完全反讽的叙事，对中国乡村文化和文明的吃人的本质做了入木三分的文明史揭示与描绘。《祝福》中“祥林嫂之问”依然叩响在中国乡村文明的灵魂深处。今天的中国乡村还留有一切封建文化残存的文明土壤，还在不同程度地影响着人们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它们是实现乡村振兴目标的最大的无形障碍。

不彻底阻断它的代际传递路径，脱贫后再返贫，就绝对不是什么耸人听闻和夸大其词。因此，它依然需要现代文明通过代际努力对之持续加以改造，使之再生出文明之花，再结出文明之果。乡村创造了文明，也产生了腐朽。乡村振兴就是要通过再造乡村文明化腐朽为神奇。这是乡村振兴过程中需要完成的乡村文化治理现代转型，提升乡村社会文明程度的历史重任，一个文明转型的当代史重任和未来史重任。

## 五、以新发展格局构建乡村文化治理双循环文明体系

在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进程中，中国的乡村是一个以内循环为主发展的文明载体。伴随着农耕文明，中国乡村走过了不平凡的几千年，在没有外力强行进入的情况下，其内部结构保持超稳定的状态。虽然期间战乱不断，王朝更迭频繁，蒙古族和满族也先后统治过中华大地，但是，支撑其主要的经济体系和文化体系的文明形态并没有发生本质性的变化。不同民族都为中华文明贡献了它的体系性价值。

1. 农业与手工业的长期共生性演化，使得小农经济的社会形态并非纯粹由农业支撑，而是通过农业生产和家庭手工业生产相结合的方式，维持着生产者家庭不饥、不寒的小康生活。农民靠农业生产维持生计，靠家庭手工业增加家庭收入。以农业为生，兼具工匠的角色，构成了一种极具中华文明特色的中国乡村治理文化及其治理能力和结构体系。宋代发展到了臻于完善的高峰。这在《清明上河图》和《水浒传》中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2. 虽然在这个过程中，域外民族通过陆上和海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和中华文明发生着经济互贸和文化互通，但是，它们都只是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被中华文明消化吸收和转化为中华化，并没有对中国乡村的社会文化结构产生根本性的影响与转变。尽管在各种各样的历史内乱过程中，中国的乡村一再被毁于战乱和兵灾，但是，迁徙到了一个新的能够安居的地方之后，中国传统的乡村社会和村落结构形态又得到重建与再生。这样的乡村案例在中国乡村数千年发展史中不胜枚举。安徽西递宏村可能是它最为典型的一个代表。这是一个在唐朝为躲避安史之乱而南下的难民再次落户后而建成的古村落，并得以在明清之际因徽商和新安文化的生成而成为中国古村落文化的代表，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这种再生能力是强大的。安

---

徽西递宏村及以它为核心而形成的整个徽州村落文化社会体系就是一个典型的历史活化石。这是在中国农耕文明社会即使发展到了明代，已经出现了被史学家称之为“资本主义萌芽”而最终没有发展出资本主义文明的重要原因。

3. 1840 年的鸦片战争，帝国主义列强通过工业文明打开了中国数千年乡土社会的文明大门。自此以后，中国乡村社会的文明运动就深受全球化进程的影响。茅盾先生的《春蚕》和《林家铺子》小说系列所表现的中国杭嘉湖地区的农村、农业和农民的命运就是对它的生动写照，而《子夜》更是对中国传统乡村社会与现代工业文明变迁之中国城乡演化的全球文明关系的全景式再现。

4. 中国乡村的衰落和乡村治理能力的衰落是近代以来全球化进程在中国的一个结果。当全球化已经成为一种最重要的人类文明进程的时候，城市文明便是它最典型的表达方式。中国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能力建设现代化也只有在这个系统过程中，而不是疏离和脱离这个过程实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的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是全球近代史和全球治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的乡村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不仅将改变中国国家文化治理能力的现代化水平，还将极大地影响全球治理结构与结构性矛盾的转化。这种转化是全球治理能力优势的转化。

中国是一个有着 14 亿人口的大国。自从全球化以来，中国的城市在传统的农业文明的基础上逐渐地发展成为一个独立的文明形态之后，城市便成为现代文明的主要生产力。它以传统文明为基础，以现代文明为主导，不断地融入现代世界文明体系中，丰富和创造着现代中国文明。正是现代中国城市文明生产力的极大发展所创造和积累起来的巨大的财富，这才使得中国有能力在短短的不到数十年间使数亿中国乡村的贫困人口摆脱贫困，实现了几千年的传统文明想实现而没有实现的文明任务。中国数亿人口的脱贫就不仅仅是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乡村的贫困文明史，而且对整个人类社会的脱贫事业，推动全球治理改革也做出了人类文明史的贡献。这一点已经得到了全世界的公认。而脱贫恰恰是中国实现乡村振兴与乡村治理有机统一的重要战略举措，其中通过发展乡村旅游业和文化产业，恰恰是推进乡村文化治理观念转型和能力优势建设，实现乡村振兴的最重要的城市文明融合。

5. 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正在从微循环走向大系统。要从大系统走向微循环，就必须推动大系统与微循环互相促进的乡村文化治理新格局的塑造与重建。通过全面改造与重塑乡村文化的微循环系统，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中乡村政治治理、经济治理、社会治理、文化治理和生态治理等全面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从乡村建设的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的根本性转变。

这已经不再是单纯的工业文明对农业文明的刚性改造，而是以工业文明所塑造和建构的现代城市与城市文明体系为中介，对整个中国建立在农耕文明基础上的乡村社会形态和文明体系进行历史性的文明置换。它是在农民对更加美好生活的追求过程中，通过让渡传统文明养成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某种权利和权力形态实现的。这是乡村文化治理变革中形成的内生需求。只有这种内生需求才能生成文化和文明自觉，才能自觉地而不是强迫地实现文明的置换。

当不实行这种文明置换就永远不能实现脱贫致富和实现对更加美好生活向往的时候，这种通过现代文明置换传统文明的方式，实现从一种较低生产力文明向较高生产力文明转移，也就历史地成为当今中国创造的一种新文明变革方式。正是这一从传统文明向现代文明转移的内生需求，规定和定义了乡村文化治理能力建设的深刻内涵、历史逻辑及其现实的生命力价值。

6. 以国内大循环为主，推动建设国际国内双循环发展新格局，是当前和今后中国发展的文明提升的大战略，这一新发展战略和新发展布局，具有文明重构的深远价值。它不仅将重塑中国与世界的文明关系与文明走向，而且也将重塑中国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的治理模式与发展走向。

乡村治理将在这个过程中重建自己的独特体系和能力结构，就像它在以往已有的五千年文明历程中所创造的独特的文明史那样，在中华文明继续构建大循环的基础上，积极推动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双循环互动发展；以乡村治理微循环为基础，实现与国家双循环的同步发展，以国家发展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构建中国乡村文化治理的新发展格局。这是一种中国乡村文化治

---

理构成的双循环文明体系，将长久地成为中国乡村振兴的新文明动力。

**注释：**

1 毛泽东：《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井冈山的斗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等文章中提出来的理论主张和思想。

2 《习近平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光明日报》，2020年12月30日第1版。